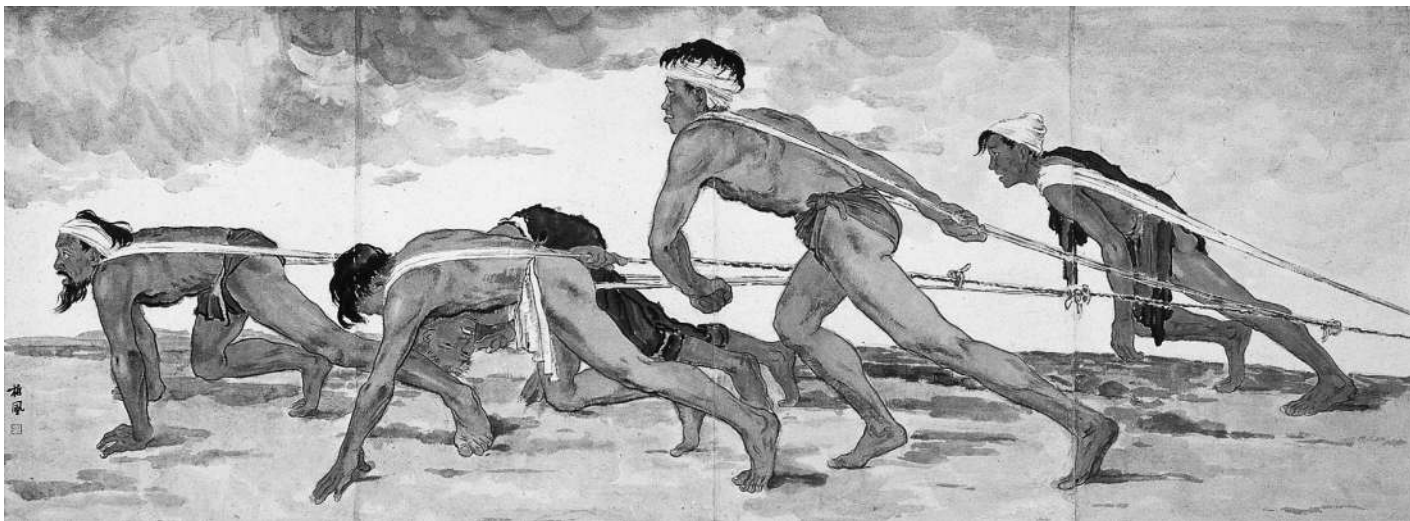


怀念李斛先生

——中国画改革创新先驱与现代中国画的开启之作

徐庆平



嘉陵江纤夫 纸本水墨设色 1946年

四川的名山大川曾给予古代无数诗人以灵感，近代则尤其成为画家驰骋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舞台，李斛便是绘画方面的一位天才与革新健将。

独辟蹊径,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李斛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艰难处境之中，化腐朽为神奇地运用中国水墨，在重庆当地用来包东西的土纸上进行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他独辟蹊径，从人物画突破，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1946年，李斛作了《纤夫》。这是多人物的大幅构图，6个人物中有用力昂首向前者，也有低头俯身以一只手支持地面者，有双手抱住腰部奋力拉纤者，有疲惫不堪几乎倒地仍在坚持用力者。动态的强烈达到极致，人物坚韧刚强的神情，特别是向侧前方用尽全力的劲势令画面传达出感人的力量。

也是在同年，李斛还凭借其过硬、坚实的素描功力尝试用中国水墨在土纸上表现人体之美。《嘉陵江纤夫》为向左侧方拉纤的5人，全部为裸体。其中有一人被部分遮挡，但露出已跪倒在地上的双腿和已几乎顶到地面的头部，背景是以淡墨绘出的波涛滚滚的江面。众多用力的裸体，特别是肌肉的表达更使画面的力度达到空前，更为了表现这些劳动者，李斛不知多少次在北碚到重庆的沿江码头和石滩上观察、记录、琢磨、酝酿、构图。他对自己的同学讲达芬·奇为《最后的晚餐》中的犹大形象，留下上百幅画稿。他便是以这样的努力来进行纤夫创作的。看到这两幅纤夫，令人有受到震撼之感。这种力量的表达、所采用的技法，甚至纸张，包括观察方法和审美角度，都是千年中国画从未有过的。它们在中国绘画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

作用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在这之前，李斛尚未毕业时的作品和刚毕业时的作品，如《战火中的难民》《山城小妹》就已开始新的尝试了，并且开拓出了现代中国画的一片崭新天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先君悲鸿公看到李斛的探索兴奋不已。两次为他题词，给予极高评价：首先是“用中国纸墨，以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兄弟为其最成功者”。然后再次赞扬他在发展中国绘画上的突出贡献：“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在第一次评价之中，先君称李斛为仁弟，即为自己喜爱的学生，而第二次改称谓为弟，则是把他看作同辈的大画家了。

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精进

在20世纪50年代，李斛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精进。在审美的两大要素“形”与“色”上，都取得了突过前人的辉煌成就。他率先在中国画中发挥出了颜色互为补色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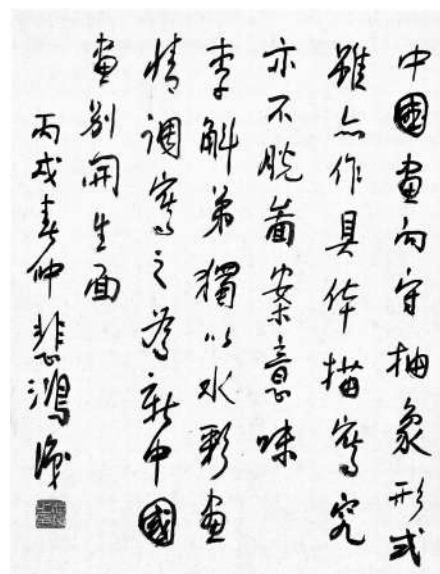


小运动员 纸本水墨设色 1959年

的魅力，使画面顿觉丰富。形与色，形与墨都达到和谐自然，尤其解决了彩与墨的融合这一中国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小运动员》以其于李凡为模特儿，画面上沁人心脾的紫与黄的互为补色关系和素描与色彩的巧妙结合堪称典范，在处理体面关系和冷暖色调的变化上微妙而自然，润润的墨块和劲健而富于表现力的墨线使得画面效果出人意料，富有音韵。《披红斗篷的老人》是展现暖色之美的力作，造型的结实，表现力的丰富、坚卓较之西方油画的杰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物神情和皮肤的质感表达都在中国人物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红色与墨的融合使画面更加浓郁而沉着，并使人物神采分外突出。这两幅杰作都是在给学生写生示范时完成的。其过硬功力和对教学所产生的作用都代表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最高水平。

《齐白石像》把老画家安排在温暖、和煦、明亮的氛围之中，似乎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身前的两只鸽子。他的左手扶着椅子把手，右手食指微曲，似乎在勾勒着眼前看到，并在心中涌现的形象。飘拂的白色长髯打破了浓墨衣褶的厚重，在画面上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运动感，将人物的头部与双手联系到一起，而且将浓墨重色的



徐悲鸿题字

人物与轻盈飘舞的紫藤花结合得完美、自然，令人赞叹。

这幅画的环境刻画引人入胜，紫色藤花与绿色藤叶，组成温馨而典雅的花海，本身已是一幅花鸟佳作。而花又有偏蓝色和偏紫色的，藤叶亦有呈现厚实的蓝绿色与代表欣欣向荣的绿黄色，把互为补色的关系运用得得心应手。呈现出黄一点的树叶被着意地安排在画的左上角，也是老人的正前方，那里好像正有一抹阳光射入一般，令人神往。浅灰色色彩的背景衬托着赭色的面部与双手和因欢笑而舞动的长须，传达出令人感动的亲切与安详。《齐白石像》堪称新中国人物肖像画的代表作。此时身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三人创新小组的李斛，已经是中国画系的主力教授，由“纤夫”开始的新中国画探索已经成熟并结出累累硕果。《女民警》《印度妇女》《关汉卿》《广州起义》《炉前浇铸》《工地探望》均令人赞叹不已，过目不忘。

李斛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上是一位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巨匠，形成了自己优美、雄奇的风格和有系统性的造型技巧和主张，他的名字和卓越成就已经镌刻在中国美术史上，无疑地应与当代美术大师并列。
(作者系徐悲鸿先生之子，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齐白石像 纸本水墨设色 1963年

《红色中华》特刊的故事

钟同福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有一份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相当于“号外”，它全面、详尽、真实地记录了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

这是一份1934年2月3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于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后，为召开大会，决定在沙洲坝老茶亭村的树林中，建造一栋规模大、造型美，具有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大礼堂由“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担任图纸设计，总务厅主任袁福钦组织实施，并在江西和福建各选调了200多名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担任大礼堂的具体施工任务。

大礼堂由1933年8月1日动工兴建，毛泽东常到工地慰问工人，工人们都说：“这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集会之处，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间、保质、量把大礼堂建好。”果然只用了4个月时间，一座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整个外形

也非常别致，从空中往下看，就像一顶红军的八角帽。

当时整个建筑用了48根木柱，为防止被敌人飞机发现，树顶上的枝丫都还保留着。这个大礼堂楼上楼下可容2000余人，有三个特点：一是门多，便于疏散，在这四周共有17道门；二是视线好，无论坐在大厅内的哪个位置，都可以看见主席台；三是回音效果佳，不用扩音设备，可以清晰听到台上的讲话。另外，在礼堂的北侧10米处，还修筑了一个回音形空洞，可容上千人。在大礼堂的门首上方还嵌着黄光书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17个楷书大字和他设计的地球仪图案。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名。旁听代表1500名左右。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总结了土地革命和建设经验。

这次大会还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大会审议和通过一系列决议，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了很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的建设更完善。

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及后来匆忙的战略转移，关于这一盛会保留下的资料不多，现在我们仅能从历经战火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史料及一些当事人零星的回忆中窥探这段历史。

这份藏品，为四开报，铅印宋体黑字，纸质泛黄，且有多处破损及虫蛀，然字迹清晰，刊载内容仍有八九成可供阅读。报头为横写美术大字“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及一个内含中国地图的北侧五角星；旁为报眉，自上而下分三排书“第七期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下书“庆祝二苏大会胜利的成功！为完全实现大会的每条决议而奋斗！”醒目大字。本期报纸共4个版面。第1版刊登《伟大的闭幕式》《大会闭幕词》，第2版通版刊登《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第3版通版刊登《闭幕前夜的会议情形》，第4版刊登《热烈的授旗典礼》《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红军烈士纪念馆揭幕典礼》《大会收到慰劳品统计》《代表成分调查表》《献给大会的礼物十二万双草鞋完成而且超过了》《红军联合队连战皆捷》《歌舞晚会上》。

《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叶坪创刊，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国共产党

廉政奉公叶成章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路下村新厝社，有一间400多年历史的三进土木结构小院，这是明万历年间名臣大理寺卿叶成章的故居。

叶成章（1573-1641），字国文，号慕同，其因敏而好学、不畏权贵、廉政奉公、政绩卓著而闻名于青史。

1619年，叶成章参加殿试进士及第，初任任江苏长洲县令。长洲县隶属苏州府，是江南富庶之地，当时权豪显贵等地方势力影响和干预官府施政已成一时风气。叶成章到任后居，官处世清廉自持，刚正不阿，改革陋政，节减开支，因此留下了“漫不省事，人呼为叶水头，居官处世，以廉廉严著称，既而判决如流，钱谷利弊，洞若观火，革陋政，节官费，绝包揽，取其奸之尤者重创之，狱讼清简”的记载，同科进士蔡献臣更是称赞其“羨君柱下著清声”。此外，还有相关记载称其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例如在催科税费方面，能够体察实情，公平有法，民众莫不信服。

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清廉的名声，叶成章被提拔擢升为都察院御史，任职期间，其就治国理政方略上奏多次，其中包括“边防十策”。戊寅（1638）年，叶成章升任大理寺卿，执掌刑狱案件审理、复核驳正等重责，因执法严明、断案严厉、铁面无私、杜绝一切说情通融，因此得罪了权臣，被屡次参奏诬告，最终被罢去官职，“削籍家居”。

两年之后，朝廷对罢免叶成章一案进行复议，并证明了其清白，决定重新召回其担任要职，但遗憾的是，叶成章已于崇祯十四年（1641）去世。

叶成章在民间口碑甚好，两袖清风，清贫度日，死后俭葬的墓地极为简易。其一生敏而好学，著有《柱下奏疏》《宣云奏疏》《宣云书钞》《微文》等文稿文集，还留下不少警句名言，其中最著名的是“吾智不能敏给，而持之以慎；才不能挥霍，而积之以勤”，这也是他廉政奉公的为官准则。

如今的叶成章故居，已成为厦门市廉政及家教家风教育基地。

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晋京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举行开幕式。

据了解，4月20日至6月20日，“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入选作品已分门别类在山东美术馆、济南市美术馆、山东画院美术馆展出，创下历届以来入展作品展览的最大规模。

在此次展览的基础上，“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晋京展”从中遴选出优秀作品243件，特邀作品223件，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和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分别展出，此次展览展品主题丰富、形式与语言多样，全面展现了全国画院专业美术家的创作面貌与实力水平。

画院作为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在“出人才、出作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据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介绍，“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由中国国家画院和地方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联合举办的一个具有品牌性、专业性、学术性的展览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八届，在业内具有较好的品牌影响力，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燕东升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精挑细选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它们主题丰富、形式多元、面貌多样，既有对传统艺术的弘扬与创新，也有对当代艺术思维的探索与表达。参展作者既有美术界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也有全国画院的中青年美术新秀。此次展览展现了新时代艺术家们的新作为、新担当，通过他们的画笔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心用情用力展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同时，此次展览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画院公共教育的职能，以美育人，为首都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展望新时代，中国国家画院将与地方各级画院一起携手同行，砥砺前行，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山东承办方始终以高标准、高规格为原则，创新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展览筹备任务。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表示：“开展前夕，加强展览的展陈设计和宣传推广等工作。开幕式结束后，随即对展览及作品进行全方位深入报道，推动艺术能量的强势传播，不断提升展览的社会影响力。此外，作为全国重要展事，以画院展为契机，能够很好促进各省画院系统利用组织优势、人才优势，不断推出美术精品、培养后备艺术人才，推动地域美术的良性发展。未来，各省、市画院将以展览为重要契机，在策展机制、作品创作、学术定位上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强化精品创作、提升学术品位，持续推动中国画院事业的蓬勃发展。”

泾伯卣



BAOZANGWUYU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泾伯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器盖内有相同内容的铭文：“泾伯作宝尊彝”，表明这是泾伯所作之器。有专家认为，泾伯一族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往甘肃一带的殷商旧族。

卣是一种盛酒器，腹部多呈扁圆罐状，有提梁。这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的器身呈直筒形，提梁两端有夔首，颈部中间也有突起的小兽首。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